

木鹿大王考

——对《三国志演义》、梅尔夫与云南纳西族间关联的试探讨^①

柿沼阳平

(日本·早稻田大学)

序

木鹿大王，对于日本《三国志》爱好者来说，可谓赫赫有名。笔者小时候，和同时代的其他很多青少年一样，以横山光辉的漫画《三国志》和吉川英治的小说《三国志》为契机，被《三国志》的魅力所吸引。当时初识木鹿大王和兀突骨等南蛮武将所感受到的震撼，至今仍无法忘记。那么，他们是真实存在的吗？如果不是真实存在的人物，那么他们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被创造出来的呢？本文就以上问题提出笔者的一些假设。

一 从《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来看木鹿大王等人的起源

(一) 毛宗岗本《三国志演义》中的诸葛南征

今天在日本脍炙人口的横山光辉《三国志》和吉川英治《三国志》等作品，都是以《三国志演义》（以下简称《演义》）为基础完成的。所谓《演义》，是根据2—3世纪的三国时代的史实创作的一部文学作品，通常认为是罗贯中所作，其内容“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章学诚《丙辰札记》）。当然，正如近现代历史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区分“实事”（史实）和“虚构”（虚构）并不容易，但某种“虚构”被置于《演义》中是确凿的“实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笔者并不赞同无

^① 本文基于拙稿《木鹿大王考——对〈三国志演义〉、梅尔夫与云南纳西族间关联的试探讨》[《木鹿大王考——「三国志演義」とメルヴと雲南ナシ族をつなぐ一試論—》，《中国古籍文化研究：稻畑耕一郎教授退休纪念论集》（《中国古籍文化研究：稻畑耕一郎教授退休纪念论集》）下卷，东方书店，2018年，第203—214页]写成。

法在《演义》中划出史实和虚构的界限这一看法。特别是《演义》中诸葛亮远征南蛮的故事中存在很多虚构的地方，频繁出现“蛮族”，他们的名字多为非汉人风格，足以令人怀疑他们是否真实存在过。是以首先通过通行的毛宗岗本《演义》来概观他们的登场画面。

在蜀汉，刘备去世后，丞相诸葛亮辅佐新皇帝刘禅。蜀汉建兴三年（225），南蛮王孟获与建宁郡太守雍闿叛乱，牂牁郡太守朱褒、越嶲郡太守高定也已倒戈到孟获一方，故而诸葛亮开始南征。其首先击败了高定军的先遣队长鄂焕，并以离间之策破坏雍闿、朱褒、高定的关系，让高定杀掉雍闿、朱褒，随后又赦免高定和鄂焕。接着，诸葛亮率军进入抗击孟获的永昌郡城，与太守王伉、功曹吕凯会面。诸葛亮让吕凯作为前导，以其《平蛮指掌图》为线索，再向南蛮腹地进军。

听到雍闿败北消息的孟获，立刻召集三洞元帅（第一洞为金环三结、第二洞为董荼奴、第三洞为阿会喃），以金环三结为中路，其余两人布置于两翼，但金环三结被杀，董荼奴与阿会喃被擒。于是孟获亲自出阵，蛮将忙牙长打先锋遭遇失败，孟获、忙牙长被捉（一擒）。

然而此时孟获对诸葛亮并不心服，于是诸葛亮决定释放孟获。孟获随后固守于泸水附近的土城，但由于董荼奴等人背叛再次被捕（二擒）。

再次被释放的孟获，杀死了叛徒阿会喃、董荼奴后，派遣弟弟孟优到诸葛亮身边，假意投降。诸葛亮将计就计，在宴会上灌醉孟优，抓捕了原计划发动奇袭的孟获（三擒）。

接着，孟获将黄金、珍珠、宝贝（海贝之一）送到八番、九十三甸等地，借助獠兵准备决战。诸葛亮到达西洱河（洱海）后，先是佯败三次，以蒙蔽孟获，随后趁其大意之际，再次将其击败（四擒）。

于是孟获投靠西南秃龙洞洞主朵思大王。蜀汉军此时苦于烈日下的日照和毒泉等，幸好诸葛亮在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庙遇到一老叟（山神），得知了万安隐者（孟获的哥哥孟节）的存在，并从万安隐者那里获知毒泉的应对方法。此时，西边的银冶洞洞主杨锋加入了孟获阵营，但随后杨锋背叛，孟获又被捕获（五擒）。

接着，孟获决定在银坑洞进行决战，根据带来洞主（孟获的妻弟）的建议，向银坑山（梁都洞）西南的八纳洞洞主木鹿大王（精通法术，骑象，能呼风唤雨，常有虎、豹、狼、毒蛇、蝎子随行，掌有三万神兵）求援。诸葛亮军顶着连弩的毒箭攻击，攻陷了三江城，杀死了朵思大王，随后又制服了从银坑洞出征的祝融夫人（孟获的妻子），并杀死了操纵猛兽的木鹿大王，又一次捕获企图诈降的孟获（六擒）。

孟获不得不投奔东南七百里之外乌戈国的兀突骨。兀突骨身高二丈，不食五

谷，吃活蛇或猛兽，身体长鳞，刀箭不穿。其属下也穿着藤甲，渡河时不沉，刀矢不入。兀突骨率领土安、奚泥出阵桃花水，击败蜀汉军。诸葛亮受阻后，在乌戈国与三江城之间的盘蛇谷（其前是塔郎甸）设伏兵烧死了兀突骨军，捕获孟获（七擒），如此一来孟获才钦心拜服。

以上就是毛宗岗本《演义》关于南征记载的梗概。其中陆续出现有着奇特名字的南蛮人阻止诸葛亮。但是，在陈寿《三国志》、常璩《华阳国志》等魏晋时期的传世史料及出土文献中，鄂焕、金环三结、董荼奴、阿会喃、忙牙长、朵思大王（秃龙洞洞主）、孟优（孟获的弟弟）、万安隐者（孟节）、木鹿大王（八纳洞洞主）、杨锋（银冶洞洞主）、带来洞主（孟获妻子的弟弟）、祝融夫人（孟获妻子）、兀突骨（乌戈国之主）（后文略作“木鹿大王等人”）等都没有出现。^①那么，他们在三国故事中的登场时间是什么时候？接下来，我们来研究一下毛宗岗本《演义》以外的各版本。

（二）《演义》版本研究所见木鹿大王等人的出场时期

《演义》起初以手抄本流传，在明嘉靖年间开始刊印，形成了复杂而多样的版本系统。其中多数是在万历（1573—1620）以后刊行的，比较早期的有嘉靖元年（1522）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本）和嘉靖二十七年（1548）的《新刊按鉴汉谱三国志传绘象足本大全》（叶逢春本）。

综观这些版本，上述南征相关记载在各版本间存在文字差异，特别是是否出现关羽之子关索（虚构的人物）^②，对区分二十四卷本（包括毛宗岗本）、二十卷繁本、二十卷简本尤为重要。在二十四卷本（除嘉靖本以外）和二十卷简本中，关索只出现于南征部分，而在二十卷繁本（叶逢春本除外）中，关索则出现于拜访荆州关羽时，南征时并没有出现。众所周知，这样的版本研究主要基于上海市嘉定区明墓出土的说唱词话《花关索传》。^③目前，关于《演义》版本的研究，在中国自不

① 关于三国蜀汉时期的南蛮或西南夷，参见拙稿《三国时代的西南夷社会及其秩序》（《三国時代の西南夷社会とその秩序》），氏著：《中国古代货币经济的持续与转变》（《中国古代貨幣經濟の持続と転換》），汲古书院，2017年。

② 参见井上泰山《我与〈三国演义〉研究（上）》（《私と「三国志演義」研究（上）》，收入《关西大学文学论集》（《関西大学文学論集》）2007年第52卷第2号）所载的《关索、花关索关系文献目录（稿）》（《関索・花関索関係文献目録（稿）》）。

③ 井上泰山、大木康、金文京、冰上正、古屋明弘著：《花关索传的研究》（《花関索伝の研究》），汲古书院，1989年。

待言，在日本也有金文京、中川谕、小松谦、上田望、井口千雪等人加意关注，^①再加上朝鲜铜活字本的发现，《演义》版本研究越发火热。各种研究以南征记载的文字异同作为线索，尝试探索各版本之间的关联。

以上述《演义》版本研究的成果为基础研究上述南蛮武将名可以发现，这些人名在任何版本之中均以同一面貌出现，与其他内容在各版本间有许多文字差异形成鲜明对比。《演义》的版本，仅金文京先生相关研究所列的就已相当多。^②笔者本人目睹的除嘉靖本、叶逢春本外，还有陈翔华主编的《三国演义古版丛刊续辑》所收的日本藏夏振宇刊本《三国志传通俗演义》、日本藏熊佛贵刊《三国志史传》（忠正堂本）、南京藏《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北平旧藏熊清波刊本《三国志全传》（诚德堂本）、北平旧藏周曰校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所收的乔山堂本《三国志传》（刘龙田本）、《双峰堂本批评三国志传》（余象斗本）、汤宾尹校本《三国志传》、朱鼎臣辑本《三国志史传》、六卷本《三国志传》（聚贤房本），以及天理图本（《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第十三辑）、刘荣吾本（《古本小说丛刊》所收）、夷白堂本、黄正甫本、杨美生本。其中哪些版本最接近《演义》原本、版本之间关系如何众说纷纭，而且上述版本也仅是全部版本的一部分。但是，先行研究者指出，被认为接近《演义》原本的版本几乎都有南征相关记载。而且，金文京、中川谕、上田望、井口千雪等人分别将各版本分为几个系统，认为其都是从《演义》原本中衍变出来的（上述版本可以全部配置在这些系统中）。从结论来看，所有这些版本都能看到上述南蛮人名。由此可以认为，上述南蛮人名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演义》诸版本衍变以前（即《演义》原本）。那么其起源具体可以追溯到什么程度呢？

二 出现于元末明初的木鹿大王等人

值得注意的是，木鹿大王等人不见于陈寿《三国志》、常璩《华阳国志》等魏晋时期的传世史料及出土文献中，其出现要追溯到《演义》原本。因此，笔者要在隋至明初之间探寻木鹿大王等人的“出现”。关于该时期的相关记载胪列如次。

唐代文献开始出现了职业的“说话人”（讲故事的艺人），其中就包括三国时代

① 相关学术史参见井口千雪著：《〈三国演义〉成书史的研究》（《三国志演義成立史の研究》），汲古书院，2016年。

② 金文京著：《〈三国演义〉的世界（增补版）》（《『三国志演義』の世界（増補版）》），东方书店，2010年。

故事的叙述者，^① 他们讲述魏晋南北朝时代没有出现的关于三国时代的传说。另外，在当时的史书、佛典、诗歌等文献中也随处可见三国时代的英雄形象。^② 但其中并没有木鹿大王等人的身影。

在宋代，可以确认有以孩子为受众的三国故事的存在，并且已经出现了像《说三分》一样把刘备作为善人、视曹操为恶人的情节。《说三分》曾在北宋首都汴京上演（《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但无法确认是否在南宋有相关演出（吴自牧《梦粱录》）。另外，《三国志平话》（后述）虽然也包含了准确的华北地理描写，但对其他地区的地理描写却很粗略。因此，有观点认为《说三分》和《三国志平话》的内容在南宋临安很少上演^③（但在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卷一一、朱熹的《朱子语录》卷三二等文本中，可以看到像是以说书师傅口吻讲述的三国故事，可见南宋时期并非完全没有人口述三国故事^④）。

此后，随着宋代瓦市、瓦舍杂剧的流行（杂剧是舞台剧的一种，以唱为中心，加上白和科），演员和剧本形式都因南北畛域差异而分化，特别是在北方，产生了元代戏曲（元曲）。学界普遍认为是受到冷落的元代汉人知识分子为赚取生活费用而创作了戏曲，但实际上戏曲的兴起可追溯到金代，特别是与介乎读书人和文盲平民之间的下级知识分子（在科举官僚身边工作的实务者等）崛起有关。^⑤ 最终，在金元时期形成了诸多与《三国志》相关的杂剧、戏曲，^⑥ 但其中并没有出现木鹿大王等人。

另外，宋元时期还出现了陈亮《三国纪年》、李杞《改修三国志》、萧常《续后汉书》、翁再《蜀汉书》、郑雄飞《续后汉书》、郝经《续后汉书》、赵复《蜀汉本末》、张枢《续后汉书》、王希圣《续汉春秋》、赵居信《蜀汉本末》等。其中一部

① 鲁迅著，今村与志雄译：《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説史略》），筑摩书房，1997年。

② 参见金文京：《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三国志」から「三国志演義」へ》），氏著：《〈三国演义〉の世界（増補版）》（《「三国志演義」の世界（増補版）》），东方书店，2010年；角谷聪：《“三国时代故事”的形成——〈全唐诗〉中三国时代的人物》（《「三国时代物語」の形成—「全唐诗」における三国時代の人物—》），《中国学研究论集》（《中国学研究論集》）2000年第5号；角谷聪：《“三国时代故事”的形成——唐代小说中三国时代的人物》（《「三国時代物語」の形成—唐代小説における三国時代の人物—》），《中国学研究论集》（《中国学研究論集》）2000年第6号。

③ 中钵雅量：《宋金时期说话的地域性：以〈五代史〉〈说三分〉讲述为中心》（《宋金说话の地域性—「五代史」「说三分」語りを中心として—》），氏著：《中国小说史研究：以〈水浒传〉为中心》（《中国小説史研究—「水滸伝」を中心として—》），汲古书院，1996年。

④ 小川环树：《〈三国演义〉发展之后》（《「三国志演義」の発展のあと》），氏著：《小川环树著作集》（《小川環樹著作集》）第四卷，筑摩书房，1997年。

⑤ 宫崎市定：《宋与元》（《宋と元》），氏著：《宫崎市定全集2水浒传》（《宮崎市定全集2水滸伝》），岩波书店，1992年。

⑥ 高桥繁树：《三国杂剧与三国平话（1）——虎牢关三战吕布》（《三国雜劇と三国平話（1）—虎牢関三戦呂布—》），《中国古典研究》（《中国古典研究》）1973年第19号；关四平：《三国题材的戏剧化》，氏著：《三国演义源流研究》（《三国志演義源流研究》）上编，龙视界，2014年。

分史书因作为《演义》的典据而闻名，现存有《三国纪年》《萧氏续后汉书》《郝氏续后汉书》《蜀汉本末》。特别是《演义》（叶逢春本）的南征记载，与《三国志》（及裴松之注）、《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的该部分文字重合度低，而与《蜀汉本末》渊源颇深，应是与《演义》原本不同的撰者参考《蜀汉本末》和民间传说进行了补充。^①但这些版本也没有出现木鹿大王等人的记载。

元至治（1321—1323）年间后，出现了《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三国志平话》的正式名称为《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在中国很早便已佚失，现藏于日本国立公文馆内阁文库，该本具有福建刊本特有的上图下文形式。当时勾栏（戏棚）之中盛行小唱（小曲）、傀儡戏（木偶戏）、影戏（影画戏）、说话（说艺）、说诨话（单口相声）等，说话内容有小说（鬼怪故事、恋爱故事、审判相关的故事）和讲史等，小说内容书籍化后称为“话本”，讲史内容书籍化后则称为“平话”。平话有时也被视为“说话”的底本，但当时《三国志》故事的“说话人”是盲人（嘉靖元年刊《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他们不可能直接阅读该书。而该书被印刷后，各页既然有插图，显然是用于阅读的。^②平话的内容包括荒诞的故事和相互矛盾的故事，也会描写人物唱着歌登场的场面，戏棚也会售卖记载这种内容的小册子。但通俗性未必意味着它们只在民间流传，先期面世的郝经《续后汉书》、赵居信《蜀汉本末》、胡琦《关王事迹》也与元帝爱育黎拔力八达（Ayurbarwada）有着很深的关系，《三国志平话》也经常官员、文人之间流传。^③《三国志平话》除了作为启蒙的教养书刊外，或许之后也被作为娱乐性质的读物被接纳了。^④

根据上述内容，从南征记载来看，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这一点虽然源于《华阳国志》，但《三国志平话》中雍闿被斩，吕凯、杜祺对付叛军，蜀将王平没有军功而被处决等情节都是无史料依据的杜撰，与《演义》也不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该书与元代杂剧中的三国故事在情节、文字方面有诸多共同之处，可见在当时应该没有除《三国志平话》以外的其他本子存在。^⑤较《三国志平话》稍晚一些的

① 井口千雪：《〈三国演义〉与〈蜀汉本末〉》（《『三国演義』と『蜀漢本末』》，氏著：《〈三国演义〉成书史研究》（《三国演義成立史の研究》），汲古书院，2016年。

② 鲁迅著，今村与志雄译：《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説史略》），筑摩书房，1997年。

③ 宫纪子：《蒙古朝廷与〈三国志〉》（《モンゴル朝廷と『三国志』》，氏著：《蒙古时代的出版文化》（《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年。

④ 小松谦：《读物的诞生——关于初期戏剧文本的刊行要因》（《読み物の誕生—初期演劇テキストの刊行要因について—》，《吉田富夫先生退休纪念中国学论集》（《吉田富夫先生退休記念中国学論集》，汲古书院，2008年。

⑤ 小川环树：《〈三国演义〉发展之后》（《『三国演義』の発展のあと》，氏著：《小川环树著作集》（《小川環樹著作集》）第四卷，筑摩书房，1997年。

则有《三分事略》，正式名称叫作《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插图、版式同于《三国志平话》，内容大致相同。一直以来，两者的源流关系是学界争论的热点之一，但无论如何，两者同出一源是毋庸置疑的。在《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中也看不到木鹿大王等人的形象。

综上所述，木鹿大王等人不仅没有出现在隋唐时期的文献，金元时期的杂剧、戏曲及其他文献中，也没有出现在《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中。然而，正如前节所论述的那样，他们的“登场”既然可以追溯到《演义》各版本分支出现之前，则或可认为他们是在元末明初出现的。

顺便一提，焦玉《武备火龙经》序（永乐十年，1412年）中有“火焚藤甲”的内容，这被看作是与兀突骨被烧死相关的记载。该书内容与焦玉本人的经历相符合，但其中混合了后世的记载，比如书中有关明代火器的部分就很详细，也就是说该书的传世版本包含了后人掺入的部分，因而被视为伪书，^①而这正可以视作木鹿大王等人起源于元末明初见解的旁证。但是为什么要创作木鹿大王等人出来呢？

三 木鹿大王等人的起源

（一）《事林广记》与木鹿大王

值得注意的是《事林广记》。这本书是由书坊刊刻的民间类书，经过多次增删修订，现存的刊本中包含许多不同的版本。该书虽然被认为是南宋陈元靓所编撰，但元代刊本中包含元代的内容，明代刊本则部分反映了明代的情况。据研究，该书的内容随着刊行年代的变化而有所调整。以下是内容鲜明反映元代特色的版本，其中有关版本①至④的介绍基于森田宪司的研究整理而成，^②有关版本⑤⑥的介绍则基于宫纪子的研究整理而成。^③

① 有马成甫：《中国的近代火器》（《中国の近代火器》），氏著：《火炮的起源及其传播》（《火炮の起原とその伝流》），吉川弘文馆，1962年。

② 森田宪司：《关于〈事林广记〉的各种版本——以日本所藏的各种版本为中心》（《「事林広記」の诸版本について—国内所蔵の诸本を中心に—》），《宋代的知识分子——思想·制度·地域社会》（《宋代の知識人—思想·制度·地域社会—》），汲古书院，1993年，第287—316页。

③ 宫纪子：《关于对马宗家旧藏元刊本〈事林广记〉》（《対馬宗家旧蔵の元刊本「事林広記」について》），《蒙古时代的东西方知识交流》（《モンゴル時代の「知」の東西》）上，名古屋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4—112页；宫纪子：《关于睿山文库所藏〈事林广记〉写本》（《睿山文库所蔵の「事林広記」写本について》），《蒙古时代的东西方知识交流》（《モンゴル時代の「知」の東西》）上，名古屋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13—149页。

①《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和刻本），共10集104卷（甲12卷、乙4卷、丙5卷、丁10卷、戊10卷、己10卷、庚10卷、辛10卷、壬10卷、癸13卷）。根据刊记，其底本为泰定二年（1325）刊行本，在此之前的版本基础上“新增”了“六十余面”的内容。该本虽然包含南宋版本的痕迹，但书中未见至元十二年（1307）以后的记录。因此可以推测，该本是在南宋版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修订时间可能为至元十三年（1308），即蒙古攻陷南宋国都临安时，后于泰定二年（1325）刊行。该本后来传入日本，于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在京都刊行，历经“山冈市兵卫刊本→山冈市兵卫与中野五郎左卫门刊本→今井七郎兵卫与中野五郎左卫门刊本”的发行顺序，因而被称为和刻本，三者内容基本一致。另外，版本①和④均由10集构成，各集内部的细目标题以“○○门”命名。而版本②和③由4至6集组成，其细目标题则以“○○类”命名。“门”的分类比“类”更为细致。

②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共4集50卷〔前集13卷、后集13卷、续集13卷（卷五至九缺）、别集11卷〕。刊记中提道：“是编增新补旧，视它本特加详焉。收书君子幸鉴 西园精舍谨咨。”出版年月不详。西园精舍是元明时期福建建阳的出版商，由于后集卷二《纪年类·历代纪年》末尾记载有“今上皇帝天历二至顺万万年”，可以推测此书刊行于至顺年间（1330—1333）。此外，后集卷六《学校类·回避讳字例》中提到“武宗、仁宗、英宗、今上皇帝”。根据元朝皇帝世系“英宗（1320—1323）→泰定帝（1323—1328）→天顺帝（1328）→文宗（1328—1329）→明宗（1329）→文宗（复位，1329—1332）”，以及泰定帝与天顺帝在天顺帝去世后被归为旁支（《历代纪年》将泰定帝记为“晋王”）可知，此中提到的“今上皇帝”应是文宗。这一细节再次印证了该书为至顺年间刊行本的结论。

③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共4集42卷。其影印版收录于《事林广记》（中华书局，1963年）。刊记与版本②基本一致，仅末尾变为“椿庄书院谨咨”。其分卷和内容也与版本②相似，因而被认为是至顺年间（1330—1333）的刊本。该本中有不少内容未涉及宋代之后的情况。关于历代王朝的记载，其将宋朝视为正统，忽略辽、金王朝。此外，在后集卷一《帝系类》中，部分宋朝皇帝的名字有缺笔现象。这表明，本书的祖本可能在南宋时期编成，并在后续的元代刊本中得到了修订。

④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共10集20卷（按十天干分目，并分上下，如甲上、甲下）。刊记中记有“至元庚辰良月郑氏积诚堂刊”。关于“至元庚辰良月”，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

(依据《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二是元顺帝后至元六年(1340)(依据《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和森田宪司的研究)。此外,日本佐贺县武雄市教育委员会所藏的残本(仅有甲乙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被认为出自同一版本,后者的影印版本已收录于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的《事林广记》中。

⑤日本长崎县对马历史研究中心藏《新编纂图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共4集87卷(?)。该本封面和刊记均缺失,但书中可见“嘉福院”藏书印。

⑥日本比叡山延历寺惠心院藏《新编纂图群书类要事林广记》(2024年未公开)。

以上是元刊《事林广记》的流传与现存情况。在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版本②③的前集卷三《郡邑类》和版本④的卷三《郡邑类》。其中列举了各地的宣慰司、路、州、县等行政区划的名称。这三个版本的《郡邑类》开头提到,至元二十年(1283)十一月,根据户数将路分为上、下两等,州分为上、中、下三等,县也分为上、中、下三等。接着又载有元贞元年(1295)五月二十七日的相关规定。一方面,在“淮东道宣慰司所管”条目中出现有“至元二十九年(1292)”这样的年份信息,而“福建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江东道宣慰司”“征东行省”等条目分别记载了“大德三年(1299)”的行政区划改动。另一方面,又记载了“银沙罗甸”于天历二年(1329)被划归“银沙罗甸宣慰司都元帅府”(《元史·文宗本纪》),至顺二年(1331)改设为银沙罗甸军民府这类的信息。因此,版本②③④中记录的“银沙罗甸”隶属“云南金齿”的行政区划设置,应是天历二年(1329)之前的情况。由此可以推断,记录上述内容的版本②③④不可能是在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刊刻的。但同时也难以确定这些版本整体反映的是至顺年间(1330—1333)还是顺帝后至元六年(1340)的状况。因此,更审慎的推测是,这些版本的内容反映了大德三年(1299)前后的行政区划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版本②③④中“大理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所管”条目下出现的“忙牙甸”,以及“云南金齿”条目下的“木鹿甸”,“镇东行省”条目下的“奚泥伽”“带来”,以及“海外四州安抚司”条目下的“万安军”等行政区划名称。乍看之下,这些名称似乎正与《演义》中提到的南蛮地域与人物存在某种关联。此外,“罗罗斯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所管”条目中的“撒里府”,也容易让人联想到《演义》中的西羌武将“彻里吉”。查看版本③的总目录,发现包括“云南行省”在内的相关条目名称附有“新增”二字。由此推测,这些地名可能是在至顺年间(1330—1333)或更早时期(可能是数年前甚至数十年前)增补的。

而版本①保留了许多南宋时期的行政区划,但未见“木鹿甸”等地名。同样,

《事林广记》洪武壬申（1392）仲春梅溪书院重刊本（藏于庆应义塾大学，以下称版本⑦）等明代刊本中也未见“木鹿甸”等地名。查看版本⑦的总目录，发现卷三中有《郡邑类》一篇，但对应内容已佚。这可能是由于该部分内容仅限于元代，因此在明代重刊时被有意删除。此外，与元代行政区划相关的史料，例如《圣朝混一方輿胜览》（收录于《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卷中“云南等处行中书省”条、元代郭松年撰写的《大理行记》以及《元史》卷六十一《地理志四》等，也都未见“木鹿甸”等地名的记载。

此外，版本⑤中也包含前集卷五《郡邑类》。其中出现了“大元一统”一语，并列出了地名，首项为“大兴府。旧名永安”。永安于1154年改名为大兴府，1215年被蒙古攻陷，至元元年（1264）改为中都大兴府，至元九年（1272）改为大都。因此，版本④记录的行政区划应为1272年之前的情况。但即使是在版本⑤中，也未见“木鹿甸”等地名。关于版本⑥，已有宫纪子进行的相关研究，但截至目前（2024年11月），笔者尚未获得阅览许可。

由此推测，《三国演义》的撰者可能将版本②③④系统的《事林广记》作为案头参考书；从中构思出木鹿大王、忙牙长、奚泥、带来洞主、万安隐者等人物形象。

然而，这些行政区划名称在前后时代的史料中均无法确认，反而仅出现在版本②③④系统的《事林广记》中。可见这些名称很可能并非实际存在过的行政区划名，而可能是版本②③④的祖本中出现的误记。况且，“奚泥伽”“带来”“万安军”本来就不是云南地区的行政区划名称。撇开众多实际存在的云南地名，偏偏将这些不明确的名词赋予南蛮武将，确实令人费解。与此同时，在云南诸多“甸”名中，仅选择“木鹿甸”捏造出“木鹿大王”，其理由也不清楚。而且基于《事林广记》的内容，也无法解释如金环三结等其他南蛮武将名称的来源。

（二）木鹿大王与梅尔夫

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木鹿大王”这一词语所承载的形象。元代和明代的人们在看到“木鹿大王”这个词时，到底会联想到什么？在诸多虚构的人物中审视木鹿大王名字的由来时，有一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料值得关注，《后汉书·西域传》“安息国”条载：

安息国，居和椽城，去洛阳二万五千里。北与康居接，南与乌弋山离接。地方数千里，小城数百，户口胜兵最为殷盛。其东界木鹿城，号为小安息，去洛阳二万里。

隋唐宋代史料中也有类似记载。^① 这些史料中的“安息”指的是阿尔沙克王朝（帕提亚帝国）。“木鹿”一般被认为是呼罗珊地区的大城市 Merv（即梅尔夫）。^② 虽然有学者从音韵学的角度对这一见解进行了批判，^③ 但在地理上将作为地理名称的木鹿视为 Merv 当无大错。^④ 根据苏其康的研究，Merv 也被称为“Muru”“Maru”“Mary”，阿拉伯语作“Marw”，古波斯语作“Margu”。在汉文史料中，Merv 也被译作“木鹿城”“穆国”“木鹿”“马兰城”“马鲁”“马卢”“麻里兀”，“马里”也像是 Merv 的异读。此外，“朱录国”是“末录国”之误，也都可以看作是梅尔夫。^⑤ 关于“穆国”，则有人释作阿摩利人^⑥，其他则没有不同见解。

另外，梅尔夫也出现在南朝梁《职贡图》上——南朝梁的萧绎（后来的梁元帝），在父亲武帝即位四十年之际绘制了这幅图。当时，在荆州刺史任上（526—539）的萧绎对因仰慕武帝之德进贡的外国使节进行了调查，并对到访荆州的使节外貌进行了写生，同时附记各国风俗，由此完成了《职贡图》。该作被认为是模仿裴子野《方国使图》的蹈袭之作。^⑦ 两者虽都未能完整流传，但在 1960 年发现的南朝梁《职贡图》摹本（1077 年完成）残片（南京博物院藏）上有滑国等十二个国家的使节绘图及十三个国家的简介。^⑧ 其中有“末国使”，被认为是梅尔夫使者。^⑨ 另有部分附记，其内容与《梁书》卷五四《诸夷传》“末国条”几乎相同，被视为《梁书》的典据。参考后者对前者加以补充，则可以释读摹本的以下内容：

末国，汉世旦（且）末国□□也。胜兵万余户。北与丁零，东与白题，西与波斯接。土人剪发，着毡帽。……。多牛羊骡驴。其王安末深盘。^⑩

① 参见 [唐] 杜佑《通典》卷一九二《边防八》、[宋]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八四《四夷十三西戎五》“安息国”条、[宋] 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九五七《外臣部》。

② Hirth 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Leipsic, 1885, pp. 142-143.

③ Laufer B, *Sino-Iranica*, Chicago, 1919, pp. 186-187.

④ Hill J. E, *Through the Jade Gate to Rome. A study of the Silk Routes during the Later Han dynasty 1st to 2nd Centuries CE.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Chronicle on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Hou Hanshu*, Book Surge, 2009, pp. 238-239.

⑤ 苏其康编著：《西域史地释名》，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年。

⑥ 白鸟库吉：《粟特国考》（《粟特国考》），氏著：《白鸟库吉全集》（《白鳥庫吉全集》）第七卷，岩波书店，1971 年。

⑦ 榎一雄：《职贡图起源》（《職貢図の起源》），氏著：《榎一雄著作集》（《榎一雄著作集》）第七卷，汲古书院，1994 年。

⑧ 金维诺：《职贡图的年代与作者——读画札记》，《文物》1960 年第 7 期。

⑨ 榎一雄：《被描绘的倭国使者——北京博物馆藏〈职贡图卷〉》（《描かれた倭人の使節—北京博物館藏「職貢図巻」一》），氏著：《榎一雄著作集》（《榎一雄著作集》）第七卷，汲古书院，1994 年。

⑩ 齐藤达也：《安息国、安国与粟特人》（《安息国·安国とソグド人》），《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研究纪要》（《國際仏教学大学院大学研究紀要》）2007 年第 11 号。

“且末”和“且末”在其他文献中也可看到，一般认为是车尔臣（Cherchen），“北与丁零，东与白题，西与波斯接”的末国在音韵、地理位置上被看作是梅尔夫。这段记载之所以提到“末国，汉世且（且）末国□□”也，是因为末国和且末国在当时被混淆了吧。

梅尔夫，原本是公元前三千年以来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文化（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的村落遗迹，被纳入阿契美尼斯朝王朝（前550—前330）版图之后，进入亚历山大大帝的统治下，被称为亚历山大（姑且不论亚历山大直接前往梅尔夫的传说及他创建城市传说的真实性）。他死后在塞琉古王朝、巴克特里亚王国、帕提亚帝国、萨珊帝国、吠哒国、倭马亚王朝、塞尔柱王朝支配下持续繁荣。三国时代的梅尔夫正处于回到萨珊帝国阿达希尔一世（约224—241年在位）统治之际，南朝梁《职贡图》所载的梅尔夫使者应该是来自吠哒古国吧。但是，与花刺子模王朝交战的成吉思汗在1221年派遣第四子拖雷彻底摧毁了梅尔夫，梅尔夫因此长达百年以上都化为荒野地带，直到帖木儿帝国沙哈鲁（1409—1447年在位）将其重建。^①因此《演义》原本面世时（元末明初），梅尔夫应该并不存在。

综上所述，“木鹿大王”的形象很容易与“梅尔夫（Merw）的大王”联系起来。他是萨珊帝国第一代君主阿达希尔一世。但现实中孟获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因此木鹿大王被认为是《演义》的虚构人物。从其原型来看，其不见于《三国志》《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资治通鉴纲目》《增修陆状元集百家注资治通鉴详节》《十七史详节》《少微通鉴节要》，或许源自《后汉书》。^②

（三）西域、蒙古系的名称

那么，为什么《演义》作者创作了“木鹿大王”（呼罗珊地区的梅尔夫大王）等形象呢？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大大超出了孟获本来的统治范围。《演义》的读者和听众可以通过这些奇怪的人名和地名感受到南蛮西南夷的异域情调。通晓历史者或多或少都能由此感到孟获统治之地何其广大，以及打倒他的诸葛亮何其伟大。这不正是原作者的意图吗？因此，如果对木鹿大王以外的人名、地名等名称由来进

① 关于其详情，参见亚伯拉罕·康斯坦丁·穆拉德热亚·多桑（Abraham Constantin Mouradjea d'Ohsson）著，佐口透译：《蒙古帝国史1》（《モンゴル帝国史1》）第7章，东洋文库，1968年。

② 根据对相关学术史的整理及研究，目前主流的研究似乎是以否定的态度来看待《演义》与《后汉书》之间的关系，参见井口千雪：《成立与发展——阶段性成立的可能性》（《成立と展開一段階的成立の可能性一》），氏著：《〈三国演义〉成书史研究》（《三国志演義成立史の研究》），汲古书院，2016年。

行考证的话，除了现在典据不明的孟优、杨锋、秃龙洞、藤甲兵，其余名称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 表示自己特征和作用的名称（万安隐者孟节、带来洞主、金环三结、兀突骨）。“万安隐者”（刘龙田本、朱鼎臣辑本、聚贤房本作“万安先生”）这一称号基于他扮演了为蜀汉士兵解毒的角色，孟节体现他重视“节”的特质。带来洞主的名字体现了其“带来”木鹿大王等为援军的作用。金环三结指向“耳带金环”的蛮兵之首，也可能是因其作为包括阿会喃、董荼奴在内的三人团体的核心而得名的。兀突骨可能同属于（1）和（3）两种情况（后述）。

(2) 象征南蛮西南夷的名称（八番、九十三甸、银坑洞、阿会喃、董荼奴、祝融夫人）。八番是指罗、程、金石、卧龙、大小龙、洪、方、韦等元代南方少数民族。九十三甸是元代地名，属于云南省（也有作九十二甸的版本）。银坑洞可能是反映元代云南银矿繁荣的地名。阿会喃的阿，在元末明初非汉人武将的姓名中较为常见，事实上明代云南第一代木氏土司的本名是“阿甲阿得”，在攻伐南宋时活跃的蒙古军官中也有叫阿术（兀良合台之子，降服襄阳吕文焕）和阿里海牙的（“会喃”的由来不明）。董荼奴，从有作“董茶奴”的版本（“荼”和“茶”自古以来就容易被混用；见叶逢春本、朱鼎臣辑本、汤宾尹校本），以及唐代以后的云南成为茶马贸易要冲来看，董荼奴容或正是源自“董茶奴（运送茶叶奴仆的监督者）”。祝融夫人来源于祝融氏（颛顼之子，火神，在《山海经·海外南经》中被视为南方之神）。而且在三国时代，南蛮西南夷中实际存在自称祝融后裔的人（《爨龙颜碑》），从这一点来看，这也是很好的命名。

(3) 西域、蒙古系的名称（木鹿大王、乌戈国、鄂焕、忙牙长、朵思大王、兀突骨、盘蛇谷）。木鹿大王已考证完毕。“乌戈”仅在个别版本中出现，有时也被释为“乌浒”（现在的壮族），但两者居住地不同，其字形和音韵也不一样，而且此外也没有将乌戈写作乌浒的成例，乌浒自汉代以来散见于史料，从未与乌戈混为一谈。或许乌戈本来作“乌弋”，可能是“乌弋山离”的简称。事实上，粟特（Suguda）在汉文史料中也作“粟弋”“粟弋”“粟戈”“粟特”等，可见“弋”字和“戈”字混淆并不鲜见。^①“乌弋山离”是亚历山大的汉译，一般被看作是坎达哈（Kandahar），松田寿男则认为是加兹尼（Gazni）^②——自亚历山大东征以来，

① 白鸟库吉：《粟特国考》（《粟特国考》），氏著：《白鸟库吉全集》（《白鳥庫吉全集》）第七卷，岩波书店，1971年。

② 松田寿男《通往乌戈山离之路》（《烏弋山離へのみち》），氏著：《松田寿男著作集1 沙漠的文化》（《松田壽男著作集1 砂漠の文化》），六兴出版，1986年。

中亚有多座城市被命名为亚历山大，因此导致这一分歧的产生。“盘蛇谷”有时也被认为是在今保山市隆阳区的蒲缥镇马街村、潞江镇道街村内^①，但没有确切的史料依据，可能只是明代以后的传说。事实上“盘蛇”这一地名并不见于宋代以前的史料之中，其可能是源于“像长蛇一样”的地形。另外，被认为是塔什干(Tashkurghan)的地名有汉盘陀、渴槃陀、渴盘陀、喝盘陀、渴饭檀、竭盘陀(可视为通假造成的变化)，很难说与其全无关系。^②关于“鄂焕”，以“鄂”为姓的人和以“焕”为名的人在宋代以前的史料中出现了一些，但“鄂焕”的组合笔者在他处没有见到。或许其是源于鄂州和吕文焕的名称组合吧！吕文焕是南宋襄阳守将，于1273年投降蒙古，鄂州(现武汉)于1258年至1259年是南宋防御蒙古军的重要冲，主将于1274年投降^③。吕文焕和鄂州主将无疑都背叛了南宋，南宋文天祥在《指南录》(1276)中将吕文焕骂为卖国贼，因此用两者名称的组合来指代蜀汉叛兵也是适宜的。“忙牙长”也不见于他处，但“忙”在蒙古人名中随处可见，“牙长”与“牙帐”相通，让人联想到蒙古。“朵思大王”“兀突骨”也不见于他处。《世本》辑本、《风俗通义·姓氏篇》《潜夫论·志氏姓》《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序》等书中也没有汉人姓“朵”或“兀”。仅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万姓统谱》卷八四引何承天《姓苑》提到了朵姓，但没有著录人名实例。但是两个字作为蒙古人名的汉译(后来转为汉姓)在元代史料中随处可见。特别是朵颜卫(兀良哈三卫的核心)，在元末明初的汉文史料中频繁出现。其前身元代“东方三王”是蒙古进攻鄂州、襄阳战役中的象征性存在。另外，兀良合台(兀良哈之长，速不台之子)在蒙哥时期与忽必烈等人远征大理，确立了蒙古在云南的统治，后又奉蒙哥之命进攻南宋鄂州。^④也就是说，兀良合台与南蛮的关系很深。而且，金文京发现关索传说(关于诸葛亮南征时关羽之子关索活动的民间传说)中的相关遗址多分布于元明时期的云南，集中在兀良合台的进军道路上，由此推测，兀良合台南征对《演义》

①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编著：《图说诸葛南征》，科学出版社，2014年。

② 参见杨銜之撰，入江义高译注《洛阳伽蓝记》(《洛陽伽藍記》，东洋文库，1990年)卷五“汉盘陀国”条之注。

③ 关于鄂州之战，参见宫崎市定：《鄂州之战前后》(《鄂州の役前後》，氏著：《宫崎市定全集11宋元》，岩波书店，1992年；杉山正明：《蒙古帝国的演变——忽必烈的夺权与大元兀鲁思的成立》(《モンゴル帝国の変容—クビライの奪権と大元ウルスの成立—》，氏著：《蒙古帝国与大元兀鲁思》(《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ウルス》)，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年。

④ 堤一昭：《忽必烈政权的成立与速不台家族》(《クビライ政権の成立とスベエデイ家》，《东洋史研究》(《東洋史研究》)1989年第48卷第1号；堤一昭：《大元兀鲁思统治江南的两大首脑家族谱系》(《大元ウルス江南統治首脳の二家系》，《大阪外国語大学論集》(《大阪外国語大学論集》)2000年第22号。

故事产生了影响^①。鉴于这一点，朵思大王和兀突骨的命名很可能源于朵颜卫、兀良哈、兀良合台的化用。而且《演义》称兀突骨身高二丈（元明时期约为 6.2m），可谓是“高耸”的“兀突”^②（也作突兀或兀兀突突）。事实上也有将“兀突骨”写成“兀突”或“突兀国王”的版本（汤宾尹校本等），可以证明兀突骨的由来之一是兀突、突兀（高耸）。另外，“骨”作为汉人人名也没有类似的例子，因此倒不如说“突骨”应该理解为“突兀”的异写。而且“骨”也是蒙古语“yasun”的汉译，意思是种族、家族，^③因此兀突骨也可以解释为“高个子种族”，这也符合乌戈国兵全部被看作是高个子这一点。

以上，对《演义》中虚构的南蛮人名、地名的由来，进行了在部分推测基础上的分类。可以发现其中有不少西域、蒙古系的名称。由此，诸葛亮在《演义》中不仅打败了云南人，还打败了与木鹿大王、乌戈国、蒙古（鄂焕、忙牙长、朵思大王、兀突骨）相关的孟获。作者或许是想通过这种手法，来演绎诸葛亮的伟大形象。另外，乍一看，“打败蒙古的明帝国”和“打败南蛮的诸葛亮”交叠在一起，越发彰显汉人的胜利。但是元末的动乱与其说是针对蒙元皇室，毋宁说是针对地主而兴起的^④，把《演义》作者的意图直接与民族主义关联起来颇令人踌躇。

结 语

根据以上论述，笔者斗胆提出一个假说：在《演义》各版本中看到的木鹿大王等人并未出现在元代以前的史料中，他们应是元末明初《演义》作者创作的虚构人物。木鹿大王等人的名字不仅体现了人物自身的特征或作用，还具有象征南蛮或西南夷的意味，同时也融入了指涉西域和蒙古的元素。因此，这些命名可能旨在唤起读者对梅尔夫（木鹿）或亚历山大城（乌戈）的记忆，以突显孟获势力范围的广大，从而体现多次俘获孟获的诸葛亮的伟大成就。

笔者在此也想提及木鹿大王等人对后世的影响。在 1381 年明朝驱逐元梁王接

① 金文京：《解说篇》（《解説篇》），井上泰山、大木康、金文京、冰上正、古屋明弘著：《花关索传的研究》（《花関索伝の研究》），汲古书院，1989年。

② [明]许自昌《水滸记·慕义》载“但见四山兀突、一水濛”，[明]徐霞客《徐霞客游记·游黄山日记》载“兀之兀突独耸者，为光明顶”，等等。

③ 小林高四郎：《蒙古民族社会结构中的姓氏与亲族名称》（《モンゴル民族の社会構造における姓氏と親族名稱》），氏著：《蒙古史论考》（《モンゴル史論考》），雄山阁出版，1983年。

④ 山根幸夫著：《“元末的叛乱”与明朝统治的确立》（《「元末の反乱」と明朝支配の確立》），《岩波讲座 世界历史 19 东亚世界的发展》（《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 19 東アジア世界の展開》），岩波书店，1971年。

管云南的过程中，丽江统治者阿甲阿得归顺明朝，获赐“木”姓，成为土司。土司是授予少数民族首领的宣慰使、宣抚、安抚、招讨使等官职的总称，乍一看木氏好像是被纳入到明朝统治之中，但实际上关系很复杂。^① 相关的详细内容可见木氏家谱《玉龙山灵脚阳伯那木氏贤子孙大族宦谱》（《木氏宦谱·正德十一年序》），木氏的祖先在东汉时期成为越嵩王，后人又成为笮国之王，在定笮县改设为昆明县的唐代，“世为昆明总军官”，等等。^② 除木氏自身的历史认识外，在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在明代也出现了记录云南部族向木鹿大王寻求他们出身的文献。从管见来看，这似可向谢肇淛《滇略》（卷九）和刘文征《滇志》（卷二八“木邦军民宣慰使司”条）寻求其起源。^③ 刘文征《滇志》成书于天启（1621—1627）年间，对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等也产生了影响。^④ 因此，《天下郡国利病书》“木邦军民宣慰使司”条中也有木鹿大王祖先说。谢肇淛于1619—1621年在云南任职期间著成《滇略》。刘文征、谢肇淛大概是在同一时期在云南听说木邦人是木鹿大王后裔的吧〔《滇志》是天启五年（1625）收笔的，其中没有提到《滇略》，所以《滇略》应该是天启五年（1625）以后刻成的^⑤〕。该说也被《滇考》卷下《三宣六慰》、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四《附录》、乾隆《腾越州志》卷一〇《边防》等所采用。这表明，虚构的木鹿大王不久就转化为云南木邦人的祖先。不过，明清地方志含有一些缺乏可信度的记载，当时被阅读的次数不多，其编纂也不是由中央政府或地方官主导的，而是应想要在地方志中彰显自己声名的地方乡绅阶层的要求形成的。^⑥ 因此，这只是一种民间传说，充其量反映了一部分人的希冀。但由此可知，云南木邦除了有尊奉《木氏宦谱》的人，也有向木鹿大王寻求身

① 山田敕之著：《云南纳西族政权的历史》（《雲南ナン族政権の歴史》），庆友社，2011年。

② 《木氏宦谱·正德十一年序》载：“东汉为越嵩王。王之后六代，改为笮国王人，定笮县改昆明，昇为昆明总军官……阿琮阿良。宋理宗宝祐元年，蒙古宪宗命御弟元世祖忽必烈亲征大理，良迎兵于刺巴江口……功列蒙古将兀良合台之右，升授副元帅……知府阿甲阿得……大明洪武十五年，天兵南下，克复大理等处。得率众首先归附，总兵管征南将军太子太师颍国公傅友德等处奏闻，钦赐以木姓。”

③ 刘文征《滇志》卷二八“木邦军民宣慰使司”条载：“旧名孟都，一名孟邦。相传蜀汉木鹿王苗裔。元至元二十六年立木邦府。后改木邦军民宣慰使司。”《滇略》卷九曰：“木邦，蜀汉时木鹿大王之后也。在姚关南度壁里江千余里，土酋罕姓以征缅甸分土。”《天下郡国利病书》“木邦军民宣慰使司”条载：“旧名孟都，一名孟邦，相传蜀汉时木鹿王苗裔。元至元二十六年立木邦军民总管府领三甸。国初内附，改木邦府，后改木邦军民宣慰使司。”

④ 古永继：《刘文征及天启〈滇志〉的史料价值》，《思想战线》1990年第1期。

⑤ 方国瑜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上》，中华书局，2013年。

⑥ 井上进：《地方志的地位》（《方志の位置》），《山根幸夫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下》（《山根幸夫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下》），汲古书院，1990年。

份认同的人。之后，包括木邦人在内的摩梭族分化出所谓的摩梭族和纳西族^①。

同样的事例并不鲜见，如清人认为西番瓦部人的祖先是金环三结。^②如前所述，金环三结原本也是虚构人物。由此可以认为，云南人不仅很早就将诸葛亮和关索进行了神化，而且在明清时期也将虚构的南蛮人物与自己的身份认同进行了关联。他们敢于把惨败给诸葛亮的虚构的南蛮人物定为祖先，其内心想法已无从知晓。就像彝族现代民间故事“七擒诸葛”（南蛮后裔对诸葛亮的“回击”）这一当地的独特传说是自古以来就存在，还是只是由于其单纯作为名人而产生的，则是今后的课题了。

【译 王博】

① 金绳初美：《云南省及调查地区的概要》（《雲南省と調査地の概要》），《关联的民族志：对中国摩梭人母系社会中“共生”的摸索》（《つながりの民族誌 中国摩梭人の母系社会における「共生」への摸索》），春风社，2016年。

② [清]曹抡彬《（乾隆）雅州府志》（乾隆四年刊本）卷一一“冷边土司”条载：“始祖恶他原籍西番瓦部人。蜀汉金环三结之后。世为西番瓦部酋长。”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五届中国文化研究国际论坛文集 /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等编. —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25. 11. — ISBN 978-7-5690-7809-1

I. K203-53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5WV5474 号

书 名: 第五届中国文化研究国际论坛文集
Di-wu Jie Zhongguo Wenhua Yanjiu Guoji Luntan Wenji
编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日本东方学会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

选题策划: 侯宏虹 杨岳峰 李畅炜
责任编辑: 李畅炜 曾小芳
责任校对: 曾悦琳
装帧设计: 李 野
责任印制: 李金兰

出版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电话: (028) 85408311 (发行部)、85400276 (总编室)
电子邮箱: scupress@vip.163.com
网址: <https://press.scu.edu.cn>
印前制作: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85mm×260mm

印 张: 20.25

字 数: 542 千字

版 次: 2025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25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08.00 元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联系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扫码获取数字资源



四川大学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